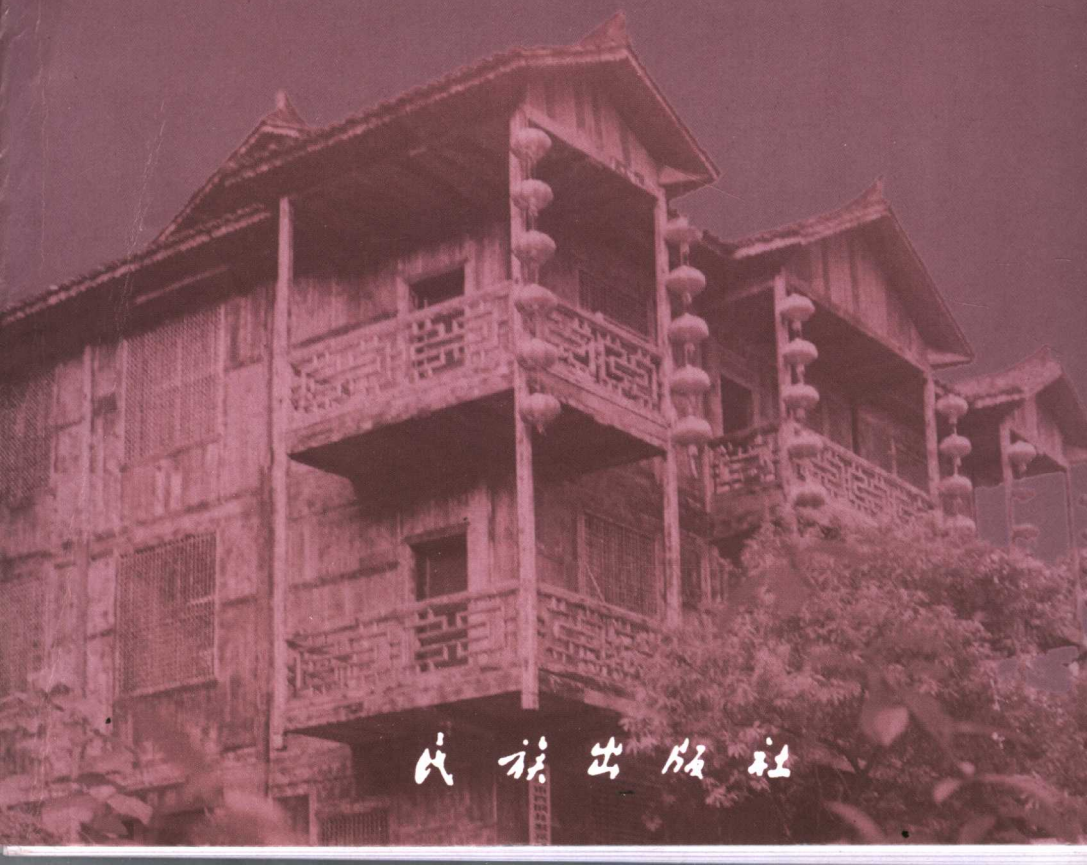
湖北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
湖北民族学院南方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研究成果

民族社会发展与文化变迁

——土家族乡村社区调查研究

编著：刘伦文 谭志满



民族出版社

责任编辑:罗　焰
封面设计:赵国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族社会发展与文化变迁:土家族乡村社区调查与研究/刘伦文、谭志满编著,-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9

ISBN 7-105-07262-8

Ⅰ.民…　Ⅱ.刘…　Ⅲ.①土家族—社会发展—研究—中国　②土家族—民族文化—研究—中国
Ⅳ.K28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12919 号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http://www.e56.com.cn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100013)
湖北民族学院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05 年 9 月第 1 版　200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7.75　字数:220 千字
印数:0001—1000 册　定价:20.00 元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汉文编辑二室电话:010-64228001;发行部电话:010-64211734)

前　言

土家族是分布在中国内陆中西结合部武陵山区的一个古老民族，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其遥远的族源可以追溯到古代的巴人。然而，现在的土家族不仅仅是巴人的后裔，还包括古代活动在武陵山区的其他族群的融入。这些民族群体并没有完全按照自己的传统延续下来，而是融合为一个新的族体，到宋代，生活在武陵山区的一部分古代族群逐渐以“土人”、“土丁”、“土兵”的称呼见于史籍，并与苗民、客民（汉民）区别开来，这就是后来的土家。在历代实行土司制度时，中央王朝基本实行汉土隔离政策，即所谓“蛮不出境，汉不入峒”，这种隔离制度一方面使土家族作为一个民族共同体更加巩固，但另一方面也使土家族与汉族的文化交流受到很大限制。改土归流以后，国家力量和民间社会力量的双重作用下，土家族社会文化逐渐转型，吸收汉文化随岁月俱增，以至晚清以后许多地区的土家人自己不认为是土家了，将自己混同于汉族。一部分土家人并不认为自己和其他民族有特别的不同之处。一些保留自己语言文化特征的土家人被误认作苗族，因而才有20世纪50年代的土家族识别问题。对土家族的民族识别，唤起了民族自我意识，民族身份逐渐恢复，具有民族标志意义的民族文化事象被挖掘整理出来为外界所熟知。土家族被认定为单一民族后，要求恢复民族身份的人数不断增加，在以后的每次人口普查时，土家族人口都有超常的增长，到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土家族人口攀升到802万。

当代土家族主要分布在湖南省的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张家界市的桑植、永定、慈利、武陵源等区县，常德的石门等地区；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宜昌市的长阳、五峰等县；重庆的黔江、石柱、酉阳、彭水、秀山等县；贵州的沿河、德江、印江等县。土家族由于处于内陆并长期与汉族交往，社会文化逐渐接近汉族，但在不同区域，

文化特征差别明显，其中酉水流域、溇水流域、乌江流域、清江流域的土家文化既有共性，又各有特点。即使在同一区域的不同社区里，土家文化受外来文化影响的深度、广度也不同。因而，文化变迁的速度也不相同。文化的纵向传递和横向传播的形式和内容上都有差异，有的社区土家族传统保留多一些，有些社区保留少一些，有些社区与本地汉族社区没有什么差别，更多表现为区域共性。譬如，土家语在大多数区域已经消失，可是在酉水流域一些偏僻山区还有保留。

要完整地认识土家族社会和文化，需要进行不同类别的社区调查研究才可能实现，通过不同类型的社区的比较来认识土家族社会文化全貌。在现代化进程中，土家族各区域传统迅速发生变迁。要认识当代土家族传统社会文化变迁的状况及其规律，不可能在书斋里通过文献来实现。应该通过深入的实地调查来获得。民族学、文化人类学、民族志研究方法的基础工作是田野工作。自从“马林诺夫斯基式革命”以来，田野工作就是人类学家的看家本领。在土家族研究中，老一代民族学家做出了很好的榜样，通过田野调查和文献梳理，完成了土家族的识别工作，为土家族研究奠定了学科基础。后代学人应承继老前辈把文献研究与田野考察有机结合的好的研究传统，把土家族研究推向深入。

近十多年来，土家族区域性历史文化的研究成就卓著。在土家族分布的各个州县的地方文人和民委系统针对本行政区域的土家族历史文化进行广泛的研究，成果很多，既有公开出版的专著，也有内部资料汇编。这种类型的研究是民族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政府“打民族牌”和“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需要相适应，因而特别受到鼓励和大力资助，各地民委直接起到了组织策划作用。一些专业学者也参与其间，增加了成果的可靠性。这方面最突出的成果表现在各地都出版了大批简史简志类著作，对本区域的土家族的来源、历史演变、政治、经济、文化的历史面貌、现实状况作了较为清晰的勾勒和描述，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线索和不可或缺的资料。正因为各地对土家族研究资料的收集整理成就突出，有的学者提出土家族研究资料工作已经完成。从文史资料来看似乎是如此，但站在人类学、民族

学学科视角上看，田野工作只是初步，第一手资料的收集才开始，并且深入到土家族各社区进行深入调查的人还不多。由于土家族只有自己的语言却没有本民族的文字，民族文化没有自己的文献记录，在古代汉民族史籍中对土家族及其先民的记载也较少，土司时期的文献对土家族土司上层社会记载稍多。大量记载土家族经济、社会、文化状况的是改土归流后流官主修的方志，但仍然粗糙、笼统，其民间文化大多无载，土家族的社会文化传统多见于土家族的现实生活。因此，研究土家族问题除要利用仅有的一些汉文献资料外，主要依靠田野调查来获得研究资料。可以说，田野工作的好坏决定着研究的质量。人类学研究的根本目的在于认识人性和文化批评，促进社会进步，而不仅仅在于“打民族牌”。只有坚持人类学文化批评的学术传统，才有利于学科健康发展，为繁荣人文社会科学做出贡献。

为了加强民族学科建设，同时，也为了弥补土家族研究中的缺憾，湖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的同仁多次深入到不同的土家族农村社区进行人类学意义的调查，并对一些典型的有代表性的社区先后申报了课题进行研究，获得了较大的收获。本书就是以“社会发展与土家族社会文化变迁”为题选取了我们进行过重点调查的三个社区的部分调查研究报告组成。这三个社区是：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景阳河社区、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龙山苗儿滩镇的捞车村、龙山县的坡脚乡。这三个社区各有特色，可以作为土家族三种不同社区类型的代表。

景阳河社区可算作是清江流域土家族社会文化状况的典型代表。它位于建始县清江中游景阳河段，历史上曾经是三种地方政权——土司、卫所和府县管辖的交叉点、插花地，居住在这里的土家人接触汉文化较早，社会文化转换也较快，如果不深入进行田野调查就很难发现其与汉族乡土社会文化有什么不同。但是，在这里，土家族社会文化仍然有其自己的特点和变迁逻辑，即使在现代化的社会大背景下，景阳河的土家人给我们展示了他们的传统文化的生存意义。雷翔教授和刘伦文副教授的研究报告从一定侧面描述分析了景阳河土家族传统文化的变迁及其意义。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捞车村位于酉水河的最大支流洗车河的中段，交通条件较好，稻田农业较发达，是土家族传统大姓彭、田、向等“聚各寨居”的典型社区，血缘与地缘关系密切，历史上是土司控制中心地带，受外来影响相对较小。但是在现代化进程中，捞车的村落社会文化变迁也表现出自身的特色，土家语近于丧失，其他作为土家族标志性的传统文化特征也在逐渐淡化或消失，有的已成为老年人的模糊记忆或特殊知识，现代性因素的导入使新的观念在萌芽，变迁的积极面和阴暗因子都呈现在我们面前。陈湘锋教授和刘伦文副教授对捞车村的调查研究报告主要围绕着宗族与村民自治和端午节日文化展示了在现代化背景下捞车村的社区文化特征。

坡脚位于龙山县的东南角的一个较偏僻的土家族社区，历史上也是土司控制的中心地带，土家族语言文化保存相对完整，20 世纪 50 年代的民族识别，一些著名专家学者曾对这个地区进行过重点调查，是为土家族被认定为单一民族提供现实依据的社区，至今仍是一个偏远落后的土家山区。这里 80% 以上的人还能用土家语交流，并能熟练操用汉语，是个典型的双语社会。因此，我们将坡脚作为土家语存留区的典型代表进行了调查研究。土家语作为土家族的民族标志和象征，在现代性逐渐渗入和人员流动加快的条件下，其命运会怎样？土家语言及其相关文化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坡脚土家族的生活方式又是怎样的？是我们比较关注的问题。刘伦文副教授和谭志满博士的报告，围绕这些问题对坡脚土家族的社会文化状况进行了描述和分析。

这些调查虽然还是粗浅的，质量还不高，理论提升不够，但毕竟是作者深入到这些典型社区观察、感受、访谈所得的成果。不揣鄙陋，编辑这样一本小册子旨在引起土家学界对田野工作的重视，加强对土家族各区域的社区研究，并促进土家学研究的学术批评和文化批评。

编著者

2005 年 3 月 1 日

目　录

前言 …… (1)
社会变迁中的土家语命运 …… (1)
土家族语言的传承
——以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龙山县坡脚乡为例 …… (21)
土家语存留区生活方式的变迁
——龙山县坡脚乡调查 …… (79)
宗族关系与村民自治
——捞车村调查 …… (117)
捞车的端午节:土家族社区文化调查 …… (166)
民间视角:清代土家族社会的演变
——景阳河社区个案研究 …… (180)
现代化背景下土家族社会文化变迁
——景阳河社区调查 …… (192)
“赶毛狗”活动的文化透视
——景阳河社区文化调查研究 …… (207)

社会变迁中的土家语命运

土家族是分布在湘鄂渝黔交界的武陵山区及其周边部分地区的一个古老的民族，2000 年第五次人口普查人口有 802 万。然而，由于土家族有语言无文字，语言文化靠口传心授代代传承，802 万人中懂得土家语和用土家语交际的人却是很少的部分。到底还有多少人能用土家语交际，现在还是个谜团，没有人说得清楚。笔者有幸参加了《土家族语言文化研究》课题调查，2003 年 5 月、7 月，2004 年 4 月走访了永顺、龙山、保靖三县保留土家语的一些核心乡镇和村寨，根据我们调查掌握的情况估计，懂得土家语或知道一点土家语的土家人有十多万人，真正仍用土家语作为交流语言的可能在 5 万人左右，最多不会超过 10 万人。按国际通行的说法，土家语正在成为一种濒危语言，并且濒危程度正在加剧。本文以田野调查为基础从社会变迁视角对土家语使用状况及其濒危化作出分析。

一、土家语使用历史状况

在历史上土家族曾经是单语社会，只有少数民族上层人士接触汉文化，懂汉语汉文，至迟在改土归流前土家族核心区还基本是这种状况。元代开始实行土司制度，那时只有少数土官懂得一点汉语，绝大多数土家人操本民族语，姓名制度都还未汉化，从一些史籍和地方志中能看到许多土家语姓名，如《土司薄》记载，南渭州土官有彭驴总可宜、彭驴恕可宜、彭始祖俾清、彭若即送等，后来的土家族地区的方志中的土司世系表里还有很多土家语姓名。封建中央王朝规定“土人不许出境，汉人不许入峒”，[1]实行土汉隔离政策，使土家族地区处于相对封闭状态，土家族与汉族交往极为有限，只有少数土司上层与外面有交往，略通汉语文。明朝统一全国以后，土家族土司纷纷内附，仍沿袭土司制。但在明代，土家族地区的民族关系格局有所改变。一是明朝为改变因战争造成的人口失衡状况和开发蛮荒之地，

采取行政移民手段将人口稠密地区的人口迁到人口稀少的地区，于是出现了所谓“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浪潮，处于入川的通道上的土家族地区，迁入了大量的汉人，加上自愿移民、逃亡入蛮和贸迁而来的汉族人口局部改变了土家族地区的民族居住格局。这为土家族接触汉文化学习汉语提供了条件；一是中央王朝极力推行同化政策，以加强对土司土民的控制。从朱元璋洪武十二年（1379年）规定土司子弟必须学习汉语汉文，否则不准承袭开始，土司上层都逐渐通晓汉文化，并能用汉文吟诗作赋，土家族的姓名制度也开始改变，借用汉族姓名制度，改汉姓取汉名。明弘治十四年（1501年）朝廷又重申这一同化政策，规定“土官应袭子弟，悉令入学，渐染风化，以格顽冥。如不入学者，不准承袭。”[2]各土司子弟为了取得生员资格，或到附近各府州县学就读，或开馆办学，延请汉儒教授子弟，因此，各土司主、土官、舍人的汉文化水平很高，尤其是容美司从田世爵以下历代土司子弟均勤勉学习汉语文，个个能诗文，形成了田氏诗人群体，有《田氏一家言》传世。[3]朝廷规定土司定期朝贡和征调土兵抗倭，援辽，镇压民变等军事活动，也是土家族接触汉文化学习汉语的重要条件。更为重要的影响是明代实行卫所屯田制。明代在土家族分布的腹心地带建立卫所等军事机构以掌控土司，于是在土家族地区形成了土汉杂居区域，这些区域的土家人逐渐习得汉语。再者土家族是一个比较开放的民族，对于优秀的外来文化都持欢迎的态度，尤其土司上层极力鼓励子弟学习汉文化，比如容美土司“以诗书为义方，严课诸男”，“有不学者叱犬同系同食”以“激辱之”，[4]把不好好学习汉文化的子弟视同猪狗。不过在土司辖区，真正通晓汉语汉文化的还主要是社会上层分子，民间社会除与汉人接触的边沿地带外，都只会讲本民族语。

清初沿袭明代土司制度并进一步加强对土司的控制，加之清初移民和商贸进入土家族地区的汉人有所增加，土家族接触汉文化的机会进一步增多。土司上层学汉语习汉文已成风尚，很多土司与山外的名儒多有交往，民间社会掌握汉语的人也开始增加，有些地区甚至开始转用汉语，放弃土家语，以至于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应

容美土司田舜年之邀游历容美进出近半年之久的江苏无锡人顾彩，在其著述的《容美纪游》[5]里未曾提到有土家语，未遇到交流上的困难，说明容美土司内汉语普及程度已很高了。特别是雍正年间“改土归流”以后，大量汉人入迁土家族地区，进一步改变了民族分布格局，民间社会互动频率加大，土家族与汉族的经济、文化交流更为频繁，掌握汉语的土家人越来越多，由单语人变成双语人。改流设县后各地流官分布了一系列禁令以改造土家族社会和文化，[6]大力推行以儒学为代表的汉文化，通过国家力量从各个方面对土家族社会加以规范，中央政府的法令，管理措施直达土民，且“一切语言，必照内地”[7]。因此，改土归流后由于国家力量和民间社会力量的双重作用，土家族社会是“旧俗渐易”，从“土人语言呢喃难辨”到“开辟渐久，能道官音者，十有五、六”。[7]大多数土家族地区变成为土家语和汉语交替使用的双语社会，汉族移民多且交通便利经济发展快的地区的土家人已逐步放弃本民族语，直接操用汉语，土家语使用区域逐步缩小。到晚清及民国时期，这一趋势不断在加强，转用汉语的地区不断扩大，双语区域不断缩小，只是在少数偏僻的地区除少数人略知汉语外大多使用单一的土家语，不懂汉语。正如《古丈坪厅志》所言“登土人之堂，闻土人之语，令人穆然于古丈坪厅之在唐虞三代”。[8]坡脚属土家族核心区域，地理位置偏僻，与 城镇附近“近皆通汉语，附郭土人之间竟忘之矣”不同，[9]土家语仍然是最主要的交际语言。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土家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广播、电影、电视、通讯和道路交通事业的加速发展，民族关系不断改善，土家族社会进一步受到主流文化强烈的影响，土家语使用状况发生了更加明显的变化。不懂汉语的人只是少数人，在一些地方只有个别高龄老年人不懂汉语，大部分土家人已操汉语，土家语汉语双语区域退缩到酉水流域少数偏僻山区。

二、土家语使用现状

现在到底还有多少人讲土家语，还没有确切统计。目前出版的有关土家语的书籍和论文说法不一，且差距较大。兹列举主要出版物的说法供参考：

1981年成书的《中国少数民族》土家族一节描述土家语状况说："土家族的语言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接近彝语支，没有本民族的文字，长期使用汉文。绝大多数土家人通用汉语，部分兼通苗语，仅永顺、龙山的一些偏僻的地区，约有二三万人只会讲土家语。"[10] 1986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土家语条说：土家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语支未定。主要分布在中国湖南省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龙山、永顺、保靖、古丈、泸溪等县，湖北来凤县的卯洞及四川省酉阳县的小咸，五福等地，使用人口约20万，分南部方言和北部方言，北部方言分布在龙山、永顺、保靖、古丈、来凤等地，又分龙山土语和保靖土语。南部方言主要分布在泸溪县的潭溪地区，使用人口约2000人。"[11]

1986年出版的《土家语简志》说："北部方言区……现在还在使用本民族语言作为交际工具的，共约十七万"。"南部方言区……现在仍在使用本民族语言作为交际工具的约有四千余人"。[12] 二者合计17.4万人左右，如果按1990年人口普查全国土家人口570余万计，使用土家语的人口只占总人口的3%左右。

叶德书、向熙勤所著的《中国土家语地名考订》前言中说："在湘、鄂、渝、黔毗邻的武陵山区，有600多万土家人。土家族有自己的语言，至今仍有40多万人操用，且保留数以万计的土家语地名。"[13]

彭英明先生主编的《土家族文化通志新编》第二章《语言文化》[14]中说："在570多万人中，现今操用土家语的只有42万多人，其使用情况大致有三类：

（一）沿用型：即本民族内部或与外人接触沿用本民族语言作交际工具。这类人有16万多。主要分布在湖南龙山县的坡脚、店房、他砂、岩冲、长潭、猛西、洗车、干溪、落塔等乡镇，永顺的对山、列夕、勺哈、高坪、抚志、麻岔等乡镇，保靖的拔茅、马王、比耳、昂洞、普戎、龙溪、仙人、涂乍等乡镇，古丈的断龙、茄通等乡镇，共有50多个乡镇的土家族聚居村寨。

（二）兼用型：即土家语和汉语兼用，社会活动中以汉语为主。这一类除上述50多个乡镇，还要加上张家界市的慈利县和常德市的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石门县的一些乡镇，鄂西来凤县的卯洞及重庆市的秀山县的石堤、宋龙等乡镇也属此类，共20多万人。

（三）转用型：这一类面积比较大，在鄂西、湘西、宜昌地区的长阳、五峰、重庆市的黔江开发区及黔东北交通便利、经济、文化发展较快的乡镇的土家人，都转用汉语汉文，但这些地区却保留了大量的土家底层语言。

土家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土家语支。它有两个方言，即南部方言和北部方言。南部方言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泸溪县的潭溪乡，操这种方言的约四千多人。”

彭勃编著《土家语研究及实录》说：“目前以土家语为主要语言的土家族人以酉水流域的为多，即湖南的永顺、龙山、保靖、古丈等地为主，桑植、慈利、永定、石门及湖北来凤、鹤峰、宣恩、四川的酉阳、秀山等县的偏僻的土家族人聚居的村寨，还有不少人会土家语。总其人数在30万左右，约占土家族总人口的6%。”[15]

湘西州《民族志》说：土家语“单用型”，“即民族内部或与外人接触，完全用土家语作交际工具”的，“按1990年人口普查数，这一类约占湘西自治州土家族人口总数的20%，即16万多”。“兼用型”的，“即土家语和汉语兼用，以汉语为主”的，有“20多万人”。[16]

黄宏娇《湖南湘西土家语地名文化的内涵》一文中说：“随着交通工具的迅猛发展和各民族的大融合，土家语正逐渐被汉语取代，其使用地域逐渐缩小，使用人数逐渐减少。目前，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仅有16万人使用土家语。”[17]

胡炳章《土家族文化精神》中说：“根据本世纪50年代对土家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的分析，在整个土家族地区只会使用土家语的而不懂汉语的人约7～8万人，且多为老年人。据最近的土家族调查情况来看，土家族语言区正在急剧缩小，至今仍不懂汉语而只懂土家语的人数也不过5～6万人”。[18]

上述反映土家族人使用土家语的数据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不同时期调查了解的情况，但使用人数都是估计数字，而不是确数，也不大可能进行一次语言普查得出一个确数来。这些估计

数据显然偏离实际情况太远，且都是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情况。其后随着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对外交往扩大、加深，深受主流社会文化的影响，土家语使用区域迅速缩小，使用人数急剧减少。据笔者调查掌握的情况看，北部方言区仅龙山、永顺、保靖、古丈等县交界区域的他砂、店房、坡脚、苗市、普戎、马王、比耳、拔茅、昂洞、龙溪、仙人、涂乍、断龙、茄通、对山、列夕、勺哈、高坪、抚志、麻岔等乡镇的一些偏僻村寨大部分或一部分还用土家语作为交流语言，并兼用汉语交流，不懂汉语只会土家语的人只有个别高龄老人，用土家语作交流语言的总人口估计在5万人左右，最多不会超过10万人（龙山县史志办张威权先生估计更为悲观，他认为真正以土家语作为交流语言的在3万人左右）。彭英明先生《志书》中所说的三种类型，第三类地区实际上早已没有人会土家语了，第二类地区已经变为转用型，只有极少数老年人知道有过土家语并能说出一些词汇来，只是第一类地区还完整保留有土家语，并通用汉语，是比较典型的双语社会，说明这类地区已经变成了兼用型。除第一类地区外，大部分原土家语存留区的土家人已主要转用汉语作为交流语言，四五十岁以上的人在家里偶尔使用土家语，30岁以下的土家人已不懂土家语，一些青少年甚至没有土家语概念了。60岁以上的老年人在一起后还能讲土家语并能用土家语讲故事，唱仪式歌、山歌。这些村寨都在上述各县的酉水流域的偏僻山区，这些地区不出两代人土家语就会全部消失。鄂西、渝东南、黔东北土家族、湘西大部分地区土家族地区仅存一些土家语地名，人们大多不解其义，个别地方有少数老年人的模糊记忆有过"土话"，只说得出个别词语。

即使在上述"沿用型"即以土家语作母语和交际语言的地区，土家语使用情况也在迅速变化。一是大量借用汉语词汇，而缺乏词汇再造能力。据邓佑玲博士的研究，土家语的汉语借词达40%以上，土家语的语音、语法、词汇、句法等深受汉语的影响；[19]二是绝大多数土家人能流利使用土家语和汉语，土家语和汉语在不同场合交替使用，但汉语使用频率有增强的趋势，土家语多在家里或不会土话的陌生人在场时使用，对外交往都用汉语；三是中青年人不完全掌握土

家语词汇，即使讲土家语时也夹杂着汉语，青少年有的只听得懂土家语，说不流利，甚至连不成句，在代际传承中土家语词汇不断在流失。四是有部分青少年不论在什么场合都讲汉语，尽管懂一些土家语词汇也不用于交际了。随着现代教育的普及和对外交往的增加这部分人有上升的趋势。从地域分布上看，在沿用型地区也逐步形成土家母语保留型、局部保留型、残存型语言分布结构。[20]保留型地区大部分土家人的日常交流语言以"土话"为主，对外交往使用"客话"。如坡脚乡是公认土家语保存最完整的地区，目前82%以上的人会土家语。其中，当地人认为土话讲得最深的报格村有974人，其语言使用状况为：只会土话不会客话的4人，以客话为主，会讲土话的122人，以土话为主，会讲客话的846人，客话交际不会土话的只1人，会讲土话一般不讲的1人（这是2003年6月17日我们根据该村户口花名册让几个村干部按我们调查拟定的标准对全村人一一归类统计的结果，不一定很准确，但能反映土家语保留型区域的大致情况）。再如永顺县和平乡的双凤村，是一个典型的土家族村寨，有85户，356人。县里准备把它建成民俗文化村，也是重点扶贫的特困村。该村土家语只能算是局部保留型，正处在转用过程中，目前真正还能讲土家语的只有21人，其中60岁以上的17人，50多岁的2人，30多岁的只2人且是从龙山土家语区嫁去的妇女。30岁以上的大多数村民只听得懂，但无法表达。30岁以下的人听说都不会，只知道一些日常生活的少数词汇。1949年以来，随着社会变革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土家语流失的速度也加快。过去水路发达，公路又通得早的地区如龙山县洗车、苗市一线，桂塘里耶一线的山区，土家语基本上是局部保留型和残存型。

所以，我们通过初步调查判断，土家语已成为一种濒危语言，而且濒危化的速度将进一步加快，大部分土家语存留地区2~3代人或更长一点时间以后土家语会消失。只有特别偏僻的山村，土家语将会保留相当长的时期。

三、土家语濒危化的社会文化因素

土家语濒危化是一个明显的社会事实，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的客观现象，尽管从民族情感上，土家人尤其是知识分子深有忧虑，呼吁抢救保存土家语，并身体力行做了许多工作，但并没有阻遏土家语濒危化的趋势。土家语濒危化是与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联系在一起的，与社会转型中少数民族被边缘化和融入主流社会的双重运动相联系的，走出边缘、融入主流社会的冲动使土家人主动放弃一些传统，包括语言。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转型加快，阶层分化、地区分化，以及民族间的发展差距更加显现出来。土家语存留区虽然都是相对封闭、经济社会发展后进的地区，但在急剧社会转型中这些地区也被拉进现代化的轨道，生存和发展的适应性选择使他们还来不及顾及传统语言文化，土家语功能在不断弱化，使用人口迅速减少。在社会转型中具体有如下社会文化因素影响着土家语的使用和传承：一是现代教育影响；二是劳动力外流影响；三是市场交易；四是城市化与现代传媒的影响。下面结合实地考察逐一进行分析。

（一）现代教育对土家语传承的影响

教育是文化创造和传承的制度化机制。民族文化的传承除了家庭教育和社区内的互动习得外，就是依赖于正式的教育制度来保证。土家族地区制度化的教育始于明清时期土司办学和府县办的学校，这些机构传播的是以儒学为代表的汉文化，数量不多，学额有限，只有极少数土家人能够通过科举进入主流社会。近现代教育在清末民国时期开始兴办，即使在偏僻的土家山区也有官办和私办的教育机构，传播近现代科学文化知识。但在 1949 年新中国建立以前，土家族地区的学校教育都还很落后，只有少数人能受到起码的初等教育，大多数人是文盲，与现代化无缘。1949 年以后，土家族地区的教育得到长足的发展，逐步建立起了从小学到大学的国民教育体系。尤其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普九”教育制度推动了民族教育的巨大发展，村村有小学，绝大多数适龄青少年都能受到起码的义务教育。在现代社会，接受良好的教育是人们寻求非农职业，实现社会流动的有效途径。在中国二元结构的制度安排下，对于农村人来说，读书、考学几乎是实现改变自身命运、改变社会地位的惟一通道。土家族人对教育的重要性已有普遍的认识，对于子女的期望较高，即使在

穷乡僻壤,土家人也还是比较重视对子女的教育投入。因为他们不论从经验观察还是理性考虑,都感觉到教育对于人生命运的价值。不论个人还是家庭,乃至整个家族,受到一定程度的教育,取得社区内或社区外的非农职业可以获得其他人没有的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在社会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个人和家庭的处境由此可以得到极大改变。因此,发展教育事业不仅是政府的要求,也是土家族民间的普遍要求。

问题是作为土家语地区的民族教育所传播的知识内容、教学语言都与土家族关系不大。在土家语存留区都使用汉语普通话教学,教授的内容是体现主流文化的知识,课程设置是统一模式,使用的是全国或者全省统编的教材,考试升学也是统一试卷,各级学校围绕升学组织教学,不可能再顾及地方性知识和民族语言文化的传播,甚至把民族的地方性知识和语言看成是普通教育的障碍。即使是曾经在个别乡镇试验过双语教育,其定位也是帮助土家族中以土家语为母语的儿童顺利的过渡说汉语,而且仅仅是试验而已。所以,在现代教育中土家族语言文化传承处于缺位状态。同时这种制度化缺位也得到民间社会的有力支持。现在,在土家语存留区,土家人普遍有一种意识,尽量控制自己不给孩子讲"土话"(土家语),教孩子讲"客话"(汉语),主动适应学校教育的制度安排。所以,在许多家庭里,父母会"土话",小孩就不会"土话",最多零星知道一些单词。我们在龙山店房、坡脚等土家语保存得好的核心区域的调查,清楚地看到这种民间的支持力。尤其是年轻的父母和在社区中处于优势地位的土家人不愿自己的子女讲土话,要求他们学好客话尤其是普通话。这是上学学好各门功课的重要条件,也是将来参与主流社会文化生活的基础。

店房中心小学的一位30岁的青年老师的讲述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土家语是民族文化,但好像没有用处,用土家语交流的人不多,没有文字难得保留。我们中心小学不用'土话'讲(课),坡脚有些村用双语(教学),汉语内容用'土话'解释,否则学生听不懂,老师全是村里人。用叶德书编的试验课本教土话。可能现在没搞了。(店房

乡)中心小学用汉语教学,无需用土话解释。乡下来的学生有的会些'土话',但不用'土话'交流,坡脚还能听到小孩用土话交流。本乡二三十岁的人听得懂'土话',但不讲。土话有失传的趋势,会讲的人基本不讲。因为没有文字,讲'土话'对学拼音有影响,对学习不利,父母在小孩面前有意不讲'土话',怕影响学习。我小时候,父母对我们就是这样。"

那位老师所反映的事实,为我们在土家语存留区普遍认为最土、讲"土话"最深的坡脚调查所证实。坡脚乡与店房相邻,1949 年前是一个乡管辖。坡脚乡的小学的确进行过所谓双语教学试验。从老百姓的话语里分析,这种试验仅仅是试验,不可能有设计的预期结果。老百姓对此多持否定态度。认为小孩本来就会土话,在学校又教土话,纯属多余,抵制这种双语教学。报格村有的村民极端地说,当时如果学校再教土话,就不送小孩上学了。报格村现任扶贫校长向××的讲述也印证了民间心态。他说:"本村孩子进学校时都讲'土话',下课孩子玩耍时也讲'土话',但上课一律用普通话,这是规定,不让讲'土话'。刚入学的孩子还不太适应普通话教学,就办学前班作为铺垫。学前班的主要任务是校正语言,已办了五个学期。学前班是一年制,老师用'土话'讲解教学内容。但到一年级后就不需要也不要求用'土话'解释课文内容。学前班的老师是报格本村的一位代课老师。以前,搞过双语试验,具有研究性质,但学生家长反对。家长认为孩子在家讲'土话',到学校还讲'土话',影响小孩学习,特别是学拼音读不准。叶德书搞了一年就停了。"万隆村的田××1997 年嫁到本乡多谷村,她谈到当年参加双语试验班时说:"爷爷讲,要读就好好读,学'土话'有什么用。本来就是讲土话的,上课也只是教那些,就不读了。"因此她上了半年试验班就转到普通班一年级去了。多谷村 60 多岁的彭××说:"现在小孩不会土话,十一二岁才转土话。回家没读书了,才开始讲'土话'。"

通过田野调查资料分析可以明显得知,正是现代教育的制度安排和土家族民间社会的有力支持,加剧了土家语的濒危化。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